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综述

王 昉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上海 200083)

摘 要:本文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的中心议题以及与会代表围绕中心议题进行的学术讨论,此外还就与会代表提交的一些重要论文及学术观点进行了概括性和综合性的介绍。

关键词: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3)02-0076-05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于 2002 年 9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了第十届年会。本届年会由山西财经大学承办。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山西大学、山西财经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河北经贸大学等全国 20 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近 50 位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参加了本届年会。会议总结了上年年会以来学会开展的各项工 作,并就本届年会的主要议题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同时还对优秀学术成果进行了表彰。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原会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赵靖教授为本次年会发来了贺信。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党委书记、校长谈敏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秘书长、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所长赵晓雷教授在会上就九届年会以来的会务工作做了工作报告。

一、积极探讨学科建设,展望学科发展前景

在本届年会上,与会代表就本学科目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进一步的发展进行了热烈讨论。代表们从各个角度探讨了学科进一步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包括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创新、新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技巧的引进、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者素质的提高等,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和崭新的思路。

(一)对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目前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谈敏教授在发言中指出了目前本学科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现为:(1)研究内容的拓展。中国经济思想史和外国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经济史等其他一些科学逐渐相互渗透和融通;(2)本学科的一些研究成果或其本身所具有的内涵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应用部门的重视。此外,海外学者对本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成果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3)本学科无论是从研究范围还是从研究方法上来,讲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和变化。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手段、分析方法也在不断地应用于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谈敏教授指出,正是在这一系列

收稿日期:2002-12-23

作者简介:王 昉(1976-),女,甘肃兰州人,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的变化当中孕育着学科新的机遇和挑战。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吴传清副教授和景新华博士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从草创起步到初步繁荣走过了约一个世纪的历程。在迈入新世纪之际,这门学科无论是在对象、任务、方法还是在关键措施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从研究对象来看,从以往的厚古薄今发展为目前的融通古今;研究任务从偏重展示到经世致用。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应该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历史借鉴和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提供理论养分两大方面强化和拓展其经世致用的功能;研究方法从规范分析到多元讨论。香港树仁学院的宋叙五教授向与会代表介绍了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在香港的发展情况,此外,他还特别提出由于经济学出身和历史学出身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认识角度上存在着差异,所以要特别注重进行交流和沟通。

(二)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建议和构想

谈敏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在目前的环境下,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者应该多一些冷静、少一些浮躁,力求多出精品力作。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提高自身的素质,包括理论素养、语言能力以及先进的研究方法的掌握,才能推动学科的不断向前发展。武汉大学的严清华教授、吴传清副教授和景新华博士提出,今后中国经济思想史在研究方法上应注重积累,积极开展学科之间的交融与渗透,紧密结合现实,同时拓宽学术视野,展开比较研究并运用现代技术不断改进研究手段,提高研究效率。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发展,不能仅仅遵循以往“坚守阵地”的目标定位,而是要走开拓创新的发展道路。武汉大学的郭笑撰博士为本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1)敢于创新和突破,包括研究方法上的突破、技术的创新和实践上的突破。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他主张引进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数量分析、边际分析等方法以及运用最新的研究手段特别是网络资源。实践上的突破是指应该找准本学科的定位,本着为实践服务的目的来进行学术研究。(2)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也应该本着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成为宏观经济的理论支持,而不仅仅是单纯的以史为鉴。

(三)作为本科学的研究人员,应该树立起研究的信心,包括本学科生存的信心和发展的信心

上海财经大学的程霖副教授指出,与其他学科相比较,本学科的学术争鸣还不够,因此研究人员还应加强彼此之间的学术交流和沟通。他还提出,在本学科的进一步研究当中是否能够尝试构建具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特色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即利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分析方法,归纳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范式这一问题。

武汉大学的李守庸教授在发言中谈到,作为一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老研究者,他对这门学科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他特别强调了学科研究队伍的建设问题:学科的发展需要老一代的研究工作者和年轻一代共同努力,只有大家同舟共济、团结互助,才能不断推动学科的进步。西北大学的韦苇教授认为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应该将历史使命和时代使命有机地结合起来,找准本学科的增长点。李舒瑾博士从自己的工作实践中的体会出发认为理论研究应该与国家经济建设需要紧密结合。历史的研究需以规划现实,指导未来为目的。孙树林研究员强调了在研究方法上应该大胆地吸取和借鉴,各种方法兼收并蓄。复旦大学的马涛教授认为目前不存在学科危机,而是有研究危机和范式危机。虽然在社会转型时期,急功近利和学术浮躁的现象严重,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他还指出从经济学出发的思想史研究是与从历史学出发的研究有很大不同的,由此他特别强调研究者掌握经济前沿理论的必要性。

二、研究晋商经济思想,弘扬晋商传统文化

本次年会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对晋商经济思想进行研究。与会代表就晋商经济思想研究相关的一些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内容涉及晋商的企业组织结构、经营管理机制、文化理念等诸多方面,这些研究对于弘扬晋商文化,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交融具有积极

的推动作用。

(一) 晋商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山西财经大学的孔祥毅教授重点研究了山西商人对中国商业经济的贡献。他认为在明清这一中国的商业革命时期,山西商人为中国的商业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在流通产业领域中的一系列创新对当代市场经济建设仍然有启示作用。孔祥毅教授系统地总结了山西商人对中国商业革命的贡献所涵盖的各方面内容。

(二) 晋商徽商的比较研究

山西大学的刘建生教授和燕红忠从文化传统与经营管理机制的互动层面,对晋商和徽商经营管理方面的差异及特征,以及他们形成不同管理特色的历史背景和运作机制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指出,宗族关系上的差异是晋商和徽商形成不同管理机制的主要原因,而两者宗族观念的差异及经商性格的不同则在于两方面:山西的重商理念厚于徽州以及山西商人甚少举族迁徙。刘建生和燕红忠还分析了晋商和徽商管理机制的生成机理,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动机和成本—收益的权衡,徽商在经营管理活动中特别强调宗族控制和血缘网络,而晋商则更注重地缘关系及其内部激励。

(三) 晋商的经营管理机制

北京大学的周建波教授研究了集股经营制度与晋商兴衰的关系,他指出晋商的兴起,一方面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了商业的繁荣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晋商的集股经营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然而,集股经营制度本身存在制度上的缺陷,致使晋商不能应付社会的变化。通过对晋商的集股经营制度的研究,周建波教授得出结论是:(1)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非常重要,民营企业如果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照样会出现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问题;(2)企业家文化素质的提高非常重要,关系到能否在社会的变动中有效地把握市场机会,有力地降低经营风险。河北经贸大学的张增强副教授探讨了晋商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他从晋商的儒学理念以及经营运作机制着眼,认为晋商之所以繁荣昌盛 500 余年而不衰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在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影响下,晋商形成了笃诚信、重义利、广布商德、崇尚节俭、吃苦耐劳的品质;另一方面是由于晋商创造了股份制经营的方式。

三、探索新方法,拓展新领域

本次年会围绕 3 个主题征集会议论文:1.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立足于晋商的考察。2. 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3. 海外华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大会共收到提交的涉及主题及其他相关领域的会议论文 24 篇。本届年会的论文呈现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既注重了研究的继承性,同时又注重了研究方法的创新和研究领域的拓展。许多论文选题新颖,内容广泛,视角独特,见解深刻,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创新。既有对现代经济理论发展历史的剖析,也有对新的研究思路的探索,还有一些涉猎了以往研究不足或未有研究的新领域,开拓了本学科新的增长点。本届年会论文的另一特点是注重理论研究和现实经济问题的紧密结合,“经世致用”、“古为今用”已成为本学科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这些特点反映了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将向着多角度、多元化、综合化、系统化发展的趋势。

(一) 注重系统性、综合性的研究

本届年会的论文较之以往更加注重对于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乃至对本学科的发展进行全景式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复旦大学的叶世昌教授在《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述评》中系统研究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他在对建国以前公开出版的有关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主要论著进行了评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三点看法:一、不能低估建国前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成就。二、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体系应该是按人物或按专题两种甚至更多种并

存,各反映其所长。三、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目的不仅仅是认识和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上海财经大学的赵晓雷教授在《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论纲》一文中对1949—1999年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作了全景式的勾勒,内容包括中国经济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研究、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构造“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尝试。划分和整理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线索,给出了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史的理论框架,并作了纲要式的分析。河北经贸大学的张一农教授在《我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史的兴起与发展》中回顾了对中国古代经济管理思想进行研究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分析了中国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之所以被世人所倾慕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经济管理思想文化是具有无限生命力的,应当被不断发扬光大。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同勋教授在《近代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一文中认为,19世纪下半叶,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与外国资本激烈的竞争中得以逐渐发展和壮大,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一批民族企业家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经营管理思想,并在企业管理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王同勋教授认为,正是由于民族企业家们善于适应社会经济形势和经济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革经营管理观念、不断改进管理的方式方法,从而使得民族企业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为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二)新的研究方法的尝试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北京师范大学的石士奇教授在《论欲望、稀缺与先秦经济思想》一文中从西方经济学的两大概念欲望和稀缺出发对先秦经济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他认为先秦各家的经济思想都是从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关系出发的,这也就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所说的欲望和稀缺。其中荀子的思想尤为突出,他认为荀子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最明确地从欲望和稀缺出发研究经济问题的思想家。石士奇教授进而阐明先秦的思想家面临的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而形成了有中国古代特色的经济思想。复旦大学的马涛教授则注重了对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新思路的探索。他提出如何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与现代主流经济学打通,将是21世纪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发展中应该引起重视的一个新思路和新趋势。在《孔子中庸观与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理论的综合》一文中,他指出中国经济思想史可以采用通过研究经济思想史或历史上某些对经济活动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来表达某种经济学的观点这一新的研究方法。从这一角度出发,他在文章中认为,孔子提出的中庸观有助于我们思考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当代综合。马克思的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经济学代表着经济学中的“两端”,通过“执其两端”,“和而不同”,就可以完成其理论的综合。香港树仁学院的宋叙五教授在《从司马迁到班固——论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一文以司马迁和班固作为两个样本来观察,对中国经济思想的转折进行研究。他指出,从样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由于学术、环境的转变,中国经济思想发生了180度的转变。自此,中国经济思想,自乐观、自由开放的性格,转折入封闭、保守的方向;由肯定人类求利致富的本性,转折入压抑人类本性的方向;由重视百业转折入农本主义的方向;由文人学者热心讨论经济民生,转折入避谈经济民生、耻谈百工技艺的方向。

从新的研究内容的发展和开拓方面来看,河北经贸大学的武占江副教授在《刘古愚经济思想述论》中以翔实的史料介绍了陕西近代历史上著名的维新运动领袖、教育家刘古愚的经济思想。文章指出,刘古愚的经济思想以实学为底蕴,是综合而系统的,同时在经济思想的重建中非常注重保留传统儒学的一些相对合理的核心价值观。中南财经大学的邹进文教授在《中国预算理论和预算制度的早期现代化研究》一文中研究了清朝末年西方预算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他在文中提出,传统财政制度向现代财政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预算制度的现代化是财政制度的起点和核心内容。清朝末年西方预算思想通过各种方式在中国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同时清政府在西方先进预算制度的示范作用下对传统的预算制度进行了改革。因此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预算思想向现代预算理论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在中国预算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山西财经大

学的毕世宏从在《中国产业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一文中运用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产业经济思想的变迁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目前之所以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产业体系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产业经济思想。复旦大学的冯华博士在《对〈史记·货殖列传〉中“以武一切”的一种解释》中对《史记·货殖列传》中的“以武一切,用文持之”提出了与目前学术界不同的观点:“用不符合常规的竞争手段灵活权变(来致富),再用符合常规的礼仪法度来保持财富。”

(三)更加注重理论研究与现实问题的紧密结合

武汉大学的李守庸教授在《孟子义利观对中国当代企业家的启示》中从分析孟子关于如何对待义与利的论述出发,认为中国当代企业家在谋求企业的发展和经济利益的获得时,必须坚持以义制利的原则。包括:一是处理好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二是重视员工利益,平等对待员工;三是在企业之间的竞争中也要坚持以义制利的原则;四是国际竞争中遵守国际规章、法规;五是保护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复旦大学的吴申元教授和徐建华在《诚信: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道德基础》一文中在分析和阐释了中国传统的“诚信”思想以及“诚信”与中国传统的商业道德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社会信用严重缺失,对我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危害。因此需要从道德和制度两个层面着手来提高社会的诚信水平。北京大学的郑学益教授在《思想制胜的新世纪营销》一文中提出,新世纪的营销,决胜在思想,而历史给思想以粮食和驿站。他从分析传统的营销思想遗产包括范蠡、白圭关于市场预测的思想认识和司马迁有关选择市场机会的理论分析入手,指出在现代营销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中,生产观念、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社会市场营销观念依次占据主导地位,并出现了学习营销、合作营销等新理念、新方式的情况下,我国企业只有扎根中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同时以积极的态势从西方现代营销学中汲取营养,中西熔于一炉,才能使中国式的营销思想和实践显示出独有的魅力。北京师范大学的张跃副教授在《海外华商及台港企业家讲求诚信和职业道德的启示》中指出,在市场经济社会,诚信作为一个企业家所必需遵守的职业道德原则,关系到其事业的成败。他从海外华商及台港企业家讲求诚信和职业道德并获得成功的案例和经验中对此进行了论证和说明。

A Summarization of the Ten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WANG F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083,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topics and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Ten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nd it also makes some summarizing and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 to some of the major these presented by representatives and academic viewpoints.

Key words: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Association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the Tenth Fall Due Annual Meeting